

文艺批评新视角

——结构主义批评与中国文学

魏家骏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文艺批评新视角

——结构主义批评与中国文学

魏家骏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南京

文艺批评新视角

魏家骏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4,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305—00923—7/I·68

定价：3.90 元

自序

进入80年代以后，学术界理论界掀起过太多的这样“热”那样“热”，但也许正因为“热”得太快的缘故，所以“冷”起来也就不慢。难怪有一段时间，人们要慨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已经成为古代文人的理想。但是，如果我们的理论都只是满足于“各领风骚三五年”，那么也就可以想见，这样的理论终将是飘若浮萍，而这样的理论家也就难辞“狗熊掰棒子”之讥。

西方文艺批评的新方法热是1985年开始的事情，时隔三年就迅速降温，并且也不免成为过眼烟云。因此，今天当我再来重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老调的时候，便多少有一些惴惴不安，似乎在给倒了胃口的人奉上一盘残羹剩水。不过，早在两年多前，当我在报刊上浏览国内的学术先进们引进介绍的结构主义理论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人连西方结构主义批评家常用的“叙述语言”这个概念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在那里洋洋洒洒地大发议论，便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介绍与引进是不会有生命力的。看来，问题不在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本身，而在于我们自身的理论修养、器识和才具。我们在介绍引进西方文艺批评方法的时候，虽然注意了选择，但缺少的却是系统的思索，甚至还可以说缺少那种兼收并容、取精用宏的理论气魄和理论建构的能力。而引进介绍毕竟是省力的事，鉴别、思索与重建却需要花很大的气力。事实上，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如果不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则很难让它生根，并终将为人们所遗忘，这也许正是我国近代和现代文化史上一再重复的教训。

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我想，对西方文艺批评方法论的引进问题也应作如是观。如果我们不注意联系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对这些方法加以消化和吸收，并且将它应用到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去，只是生吞活剥地复述一通，或是半生不熟地加以发挥，那么这些方法终将无法施展其自身的理论力量和适应能力，“方法”一说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接触到结构主义批评这一方法以后，我便想以此作为思考的中心，探索怎样使这种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能够扬长避短，改变它那唯形式的研究倾向，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基础上，使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在与艺术内容的关系中找到其思想上的依据，对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中的实现程度及途径作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形式特征的研究才有可能有机地纳入思想与艺术完整统一的大的美学系统中，并使形式获得切实的社会历史内涵。我以为，对结构主义文艺批评进行这样的改造，应当是恩格斯所期望并倡导的美学的和历史的相统一观点的题中之义，而且也有助于为我们从美学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观点来进行文艺批评找到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具体的切入点。当然，我这里提供的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也只是一种探索与尝试，还望识者有以教焉。

本书的写作得到国内前修时贤译介的西方文艺批评方法论著的许多启发，应当感谢他们功不可没的劳绩。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在国内各地刊物发表过，也得到许多编辑同志的鼓励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著 者

1990年10月11日夜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导论	(1)
(一) 索绪尔：结构主义之父	(3)
(二) 从乔姆斯基到列维—斯特劳斯	(10)
(三) 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17)
第二章 理论源流	(21)
(一) 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发轫期	(22)
(二) 捷克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	(40)
(三) 叙事学：结构主义的法国阶段	(54)
第三章 文学密码的破译	(82)
(一) 结构主义的阅读和阐释模式	(83)
(二) 诗歌艺术的语言学求解	(94)
(三) 陌生化：现代小说叙事方式变异	(108)
(四) 结构主义的中国学派	(123)
——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	
第四章 作家风格的结构性阐释	(138)
(一) 陆文夫小说的叙事模式	(139)
(二) 马烽叙事模式及其作品的艺术得失	(150)
第五章 小说蕴涵的结构性阐释	(164)
(一)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表层结构 与深层结构	(166)

(二) 《大林莽》本体象征论·····	(179)
(三) 《远行》的表层和深层意蕴·····	(190)
——何士光小说《远行》细读及本文分析	
第六章 比较方法：叙事模式研究的基础·····	(203)
(一) 化外之民·····	(205)
——东西方文学中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	
(二) 陈世美故事母题及其结构性改造·····	(218)
(三) 一个历史故事的两种艺术处理·····	(233)
第七章 现代批评方法的互渗特征及一体化趋向·····	(246)

第一章 导 论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许多学科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的广泛流传和应用，并不是因为它有着统一的哲学观点，而只是因为它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的方法有着较为广泛的适应性。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作为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就毫不讳言地说：“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它对社会事实进行试验，把它们转移到实验室。在这里，它首先注意的是关系，试图以模型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①正是由于他首先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应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领域，建立起结构主义方法的基本模式和操作程序，使结构主义开始正式走进了社会—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涌现出一批戴着结构主义徽号的学者，如结构主义历史哲学家米歇尔·富科、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政治理论家濮兰查斯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等等，在法国理论界和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结构主义的热潮。

尽管结构主义思潮在60年代的法国呈现出崛起的声势，大有17世纪末中国的北京“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学界流风，然而结构主义思潮的起源却必须上溯到

20世纪初瑞士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他所建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体系，为后来的结构主义方法奠定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基础。而且，还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就有一批青年文学理论家开始倡导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维·什克洛夫斯基、鲍·艾亨鲍姆、鲍·托马舍夫斯基和后来移居捷克，与捷克学者穆卡洛夫斯基合作，建立起布拉格学派的罗曼·雅各布森。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流派演进的研究中，习惯上就把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称为“结构主义思想发展路程上的三站”^②。

当然，结构主义思潮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最后在法国巴黎达到它的全盛阶段，其间经历了约半个世纪，跨越了大半个欧洲，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人物，尽管他们是在不同的领域里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并各自独立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模型，但他们在对结构、结构分析的方法等方面所持的基本原则却是大致接近的。而且，就文学批评而言，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注意到了文学作品的语言因素的分析，然后借助于语言分析的方法对诗歌语言和小说叙事方式进行研究，以致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诗学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两个重要的流派，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提供了两种最重要的范型。

正因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同语言学的关系是那样的难解难分，我们不得不从为结构主义理论批评奠定了理论思想和方法原则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起。

(一) 索绪尔：结构主义之父

索绪尔(1857——1913)是瑞士语言学家，他年轻时曾先后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以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院教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溘然辞世。后来，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等根据他的一部分手稿、材料和同学们听课时的笔记，编辑整理而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并连续再版两次，以后又由各国语言学家把它翻译成德、西、俄、英、日等国文字，使他的语言学理论流布到了全世界。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对语言的历时性研究变为共时性研究，从而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一场重大的变革。以往的语言学着重通过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这种语言的变化：语音、词汇、语法等的变化规律，因而被称为“历时语言学”；而索绪尔则强调语言的共时性研究的意义，这种研究着重从一个时代的语言的横断面来研究语言的状态，研究在一定时间里各种语言现象作为互相并列、依存和制约的符号系统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

关系和心理关系”^③，而这种共时性关系“不是任何历史过程所构成或决定的，而是现存的结构关系的网络所构成或决定的”^④。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索绪尔建立起了他的语言学体系。

他认为，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就象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一样，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符号的科学，因此，“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⑤。而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总要逃避个人的或社会的意志”^⑥，不受人为主的支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在索绪尔的时代，符号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索绪尔也只是设想有这样一种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能够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由于索绪尔富有卓见地看到了语言比任何东西都更适宜于使人了解符号学问题的性质，所以他对语言学的研究就立足在“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系统”^⑦这一理论基础之上。

任何符号都具有互相连接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可以直接感觉到的指符（signans），另一个是可以推知和理解的被指（signatum）”^⑧，语言作为符号，也同样具有相互连结的两个方面，它们不是象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事物和名称的连结，而只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连结。这两个要素紧密相连而又彼此呼应，构成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如拉丁语中的“arbor”所连结的就是“树”的概念，人们听到“arbor”这个音响，就立刻会联想到这是指代长在土地上的，有枝、干、叶的植物。索绪尔把音响形象称做“能指”，而把与这个音响形象相连结的概念叫做“所指”。他认为，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而用能指和所指分别代替音响形象和概念，“既能表明

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⑨。

根据语言的这一符号性质，索绪尔指出了它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是说能指和所指间的连结是一种纯粹的协定关系，是不可论证的，也就是说，一个语言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任何人都不能够改变它。因此，能指和所指间的连结是以集体习惯或者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能指和所指间的连结的紧密，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以致形成了这样的状态：“一个观念固定在一个声音里，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一个观念的符号”^⑩。二是能指的线条特征，也就是说，音响形象作用于人的听觉，它不同于视觉形象，视觉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展开，而听觉只能是时间的线条，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每一个听觉的能指只能和相邻的要素产生各种对立。

由于能指的线条特征，决定了语言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索绪尔认为，这表明了语言是一个价值的系统，他以下棋的规则来比喻语言状态：“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⑪对任何一个音响形象，都只能把它放到一定的链条中去，看它同其他音响形象的差异与关系，才能确定它的价值、意义。索绪尔指出：“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

别。”^⑫他认为，任意性和差异性是两个互相关联的素质，而语言系统正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断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间的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⑬。而且，他还进一步论证，在一种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着的。索绪尔的这一语言学思想，就为结构主义方法重视考察和解析要素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的原则。

正因为索绪尔注意到每一个词都必须放到一定的系统中去才能显示其价值、意义，他强调语言状态具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是句段关系，即因为语言所具有的线条特性，使它注定不可能同时发出两个声音，即同时说出两个以上的词，而只能是一个要素紧挨着另一个要素，排列成为言语的链条；另一种是联想关系，也就是人们每说出一个词，都可能会在记忆中把许多有着某种共同点的词联合起来，这种共同点包括同义、同音和相同的词根或后缀。以汉语而言，当我们说到“石油”这个词，就可能立刻联想到“食油”，或联想到“火油”、“汽油”、“煤油”……，这些引起联想所派生和涌现的词，是每个人的语言库存的一部分。索绪尔比较了这两种关系：“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⑭句段关系是水平的关系，联想关系是垂直的关系。前者是在同一空间出现的单位的排列，后者则不是在同一个空间出现的要素。

索绪尔提出这样两种组合关系有什么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呢？原来他根据这一理论进一步论述了语言和言语的不同。他说：“一切按正规的形式构成的句段类型，都应该认为

是属于语言的，而不属于言语。”^⑤ 因为言语是个人的语言行为，而语言则是社会的现象，它作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体现了社会的成规或惯例，成为一种抽象的系统，犹如象棋的抽象规律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一样，语言的本质也超越并支配着社会的人所说的话语而抽象地存在，并为大多数人所遵守，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表达、交流和传递信息成为可能。霍克斯比喻说，言语是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冰峰，语言则是支撑它的冰山，并由它暗示出来，语言既存在于说话者，也存在于听话者，但是它本身则从来不露面。语言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而言语的表现则是暂时的、形态各异的、性质复杂的，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索绪尔用一句话简洁地概括为“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它是使一个人能够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⑥。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因为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⑦，只有通过语言的研究才能正确地把握语言符号系统中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构成的内在秩序和规律。

最后，我们还必须看到，索绪尔把语言提到了现实之上，即他所说的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只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因此，在一个语言符号的内部，“一切都是在听觉形象和概念之间，在被看作封闭的、独自存在的领域的词的界限内发生的”^⑧，是一个自在的结构，一个自我包容的体系：在一个符号内，概念与音响形象对立统一，不与外界的某一实体事物发生关系；而在一个句子里，符号与符号之间，也只构成若干个能指/所指相互连接的序列，即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的运动，形成相互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不与

外界的某一实体事物发生关系。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事实上就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的基础。概括地说,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就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

1. 语言——即结构主义者的所谓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2. 意义的构成只取决于构成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要素(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3. 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几条主要原则,便对应于皮亚杰关于结构主义的界说:

把结构观念的积极特征作为中心,我们就至少能够从所有的结构主义里找到两个共同的方面:一方面,是一个要求具有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的理想或种种希望,这种理想或希望是建立在这样的公设上的:即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另一方面,……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的使用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尽管它们是有多样性的。……总而言之,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⑩

如果我们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皮亚杰有关结构主义的论述作一些对照，就会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了。

	索 绪 尔	皮 亚 杰
整体性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个成分所组成的；但是这些成分是服从于能说明体系之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的。……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为全体的全体。
转换性	语言也有这种一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的原则。……一着棋可能使整盘棋局发生剧变，甚至对暂时没有关系的棋子也有影响，……对语言来说，情况也恰好一样。	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这种种转换并不是在这个体系的领域之外完成的，也不求助于外界的因素。
自身调整性	言语从来就是只依靠一种语言状态进行工作的，介于各状态间的变化，在有关的状态中没有任何地位。	这种自身调整性质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一个结构所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超出结构的边界之外……

事实上，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这种语言学的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态和历时态、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的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

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二) 从乔姆斯基到列维—斯特劳斯

对结构主义批评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语言学家，这就是美国著名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乔姆斯基（1928——）。乔姆斯基生于费城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研究希伯来语的学者，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主要研究语言学、数学和哲学，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得到该校著名的哲学教师卡兹的理论上的支持，因此，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又被称为美国语言学中的麻省学派。

乔姆斯基认为，人具有先天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就是指说某一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内在认识——对作为这种语言所有话语基础的代码的掌握与理解。他说：“一个人的语言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体现在人脑这个有限的机体之中，因此语言知识就是一个由某种规则和原则构成的有限系统。但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却能讲出并理解他从未听到过的句子以及和人们听到过的不十分相似的句子。而且，这种能力是无限的。如果不受时间和注意力的限制，那么由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系统规定了特定形式结构和意义的句子的数目也将是无限的。”^{②③} 乔姆斯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理想的意义上，语言运用才是语言能力的直接反映。他用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关系来代替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并且认为根据这种语言的语法规则，可以创造出许多他没有听到过的新句子。这种语言的创造性就是他所主张的语言的生成性。他直接继承了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德的观点——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